

樊树志

# 晚明史



1573—1644

下

樊樹志

# 晚明史

1573—1644

下

復旦大學出版社

图书在版编目(CIP)数据

晚明史:1573—1644. 下/樊树志著. —2 版. —上海:复旦大学出版社,2015.4  
ISBN 978-7-309-11135-4

I. 晚… II. 樊… III. 中国历史-研究-晚明 IV. K248.307

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(2014)第 287310 号

**晚明史:1573—1644. 下(第二版)**

樊树志 著

责任编辑/史立丽

复旦大学出版社有限公司出版发行

上海市国权路 579 号 邮编:200433

网址:fupnet@fudanpress.com <http://www.fudanpress.com>

门市零售:86-21-65642857 团体订购:86-21-65118853

外埠邮购:86-21-65109143

浙江新华数码印务有限公司

开本 787×1092 1/16 印张 33 字数 526 千

2015 年 4 月第 2 版第 1 次印刷

ISBN 978-7-309-11135-4/K·516

定价:98.00 元

---

如有印装质量问题,请向复旦大学出版社有限公司发行部调换。

版权所有 侵权必究



樊树志，1937年生于浙江湖州。1962年毕业于复旦大学历史系，留校任教，现为复旦大学历史系教授。专攻明清史、中国土地关系史、江南地区史。代表作有《中国封建土地关系发展史》（1988年）、《明清江南市镇探微》（1990年）、《万历传》（1994年）、《崇祯传》（1997年）、《国史概要》（1998年）、《江南市镇：传统的变革》（2005年）、《国史十六讲》（2006年）、《明朝大人物》（2011年）、《明史讲稿》（2012年）、《明代文人的命运》（2013年）。

本书荣获第十四届中国图书奖

# 目录

## 下卷

### 第七章 从泰昌到天启……………557

- 一、神宗的怠于临朝与疾病缠身……………559
- 二、昙花一现的泰昌朝……………569
- 三、从泰昌到天启的过渡……………578
- 四、天启：畸形的魏忠贤专政时代（上）……………586
- 五、天启：畸形的魏忠贤专政时代（下）……………599

### 第八章 崇祯：清查“阉党”逆案……………623

- 一、受命于危难之际的朱由检……………625
- 二、不动声色逐元凶处奸党……………635
- 三、清查“阉党”逆案……………645
- 四、为东林人士平反昭雪……………666

### 第九章 袁崇焕与毛文龙……………675

- 一、从李成梁到熊廷弼……………677
- 二、从孙承宗到袁崇焕……………685

- 三、同室操戈：毛文龙之死……697
- 四、己巳之变：袁崇焕的悲剧……709

## 第十章 “党同逐异，便已肥家” ……723

- 一、“今日吏治民生夷情边备事事堪忧” ……725
- 二、“此时不矫枉振颓，太平何日可望？” ……733
- 三、朝政与党争（上）——由会推阁员引发的党争：钱谦益案……743
- 四、朝政与党争（下）——由袁崇焕之狱引发的党争：钱龙锡案……760
- 五、权力争夺：温体仁与周延儒的倾轧……769
- 六、温体仁辅政：“崇祯皇帝遭‘温’了” ……776

## 第十一章 民变蜂起：举棋不定的抚与剿……797

- 一、初起阶段的民变与杨鹤招抚的失败……799
- 二、战火蔓延山西……815
- 三、从澠池渡到车箱峡……826
- 四、洪承畴、卢象昇、孙传庭……842
- 五、杨嗣昌“十面张网”的成功……861

## 第十二章 攘外与安内的两难选择……879

- 一、对清和与战的优柔寡断……881
- 二、“盐梅今暂作干城”：杨嗣昌督师……895

三、“功虽未成，尽瘁堪悯”——杨嗣昌之死……904

四、“灭寇雪耻”成泡影：洪承畴降清……914

五、秘密媾和与陈新甲之死……922

### 第十三章 “无可奈何花落去”：明朝的覆亡……929

一、朋党政治与周延儒的复出……931

二、内战形势急转直下：李自成与张献忠……957

三、挽救命运的失败尝试：出征、南迁、勤王……979

四、京师陷落与思宗殉国……997

五、从大明到大顺到大清的政权更迭……1007

主要参考文献……1046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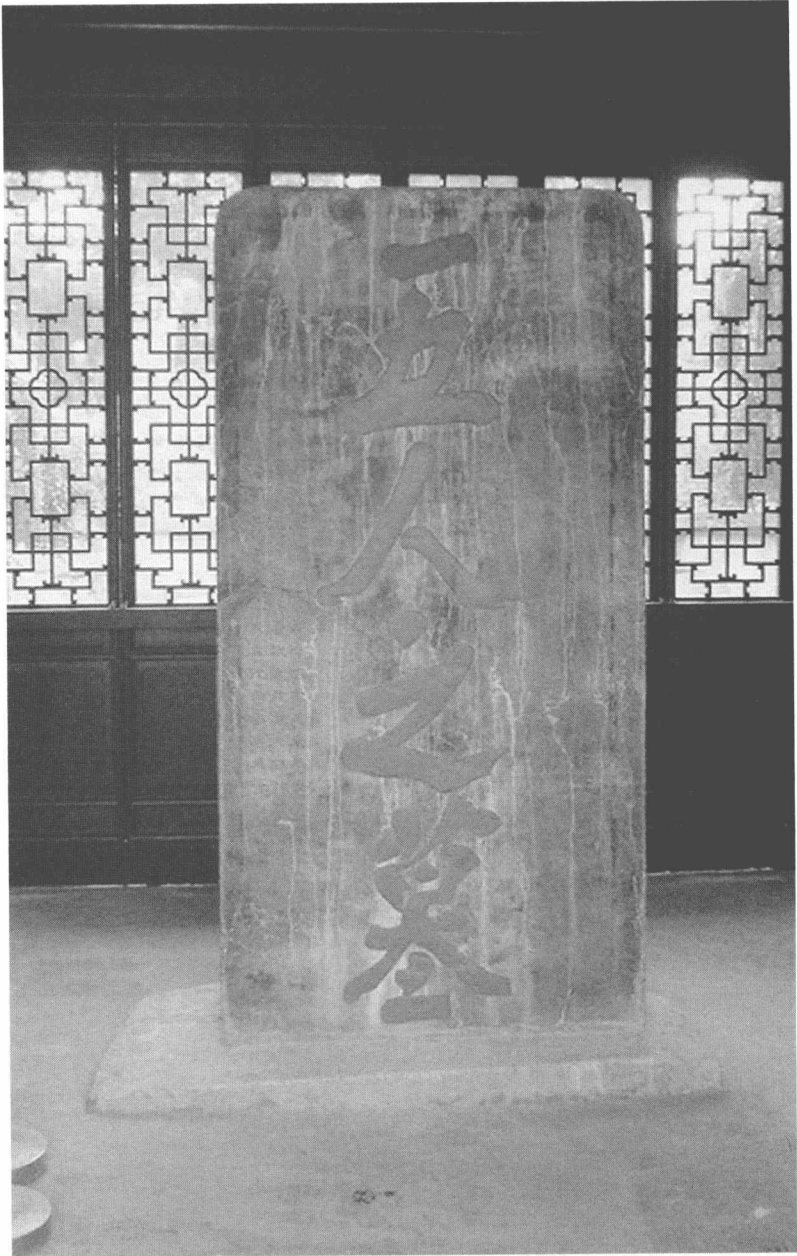
索引……1060

后记……1077



第七章

从泰昌到天启



苏州五人之墓

## 一、神宗的怠于临朝与疾病缠身

对于神宗的怠于临朝，当时的官员朱国祯说：“上（指神宗）益恭默，批发者，内外庶僚推升只一‘是’字；巡按复命举劾下部，凡阁臣部院条陈、告归疏，皆留中。淮抚李三才被劾，有救者，有再劾者，前后凡一年有余，迭积不可胜数。其余两衙门，听其自作自止，自相攻击，皆以不闻不见处之。”<sup>①</sup>

神宗是一个权力欲极强的帝王，亲政以后励精图治，一度形成了“事事由朕独断”的局面，但为什么在以后相当长的时间内怠于临朝呢？这是研究万历朝历史值得细细加以探讨的问题。然而人们的见解很不一致，见仁见智，众说纷纭。

晚明名士夏允彝（字彝仲，松江华亭人）对神宗怠于临朝的原因作这样的分析：“自（郑）贵妃宠甚，上渐倦勤，御朝日稀。迨国本之论起，而朋党以分，朝堂水火矣。争国本者章满公车，上益厌恶之，斥逐相继，持论者益坚，上以为威悚之不止也，不若高阁置之，批答日寡。后遂绝不视朝，疏十九留中矣。郊祀不躬，经筵久辍，推升者不下，被纠者不处，上之一切鄙夷也。”<sup>②</sup>夏允彝在这里勾画了神宗怠于临朝的渐变过程，先是对朝政表现出倦怠之意，上朝的日子逐步减少；以后发展到绝不视朝，奏章也懒于批答，束之高阁。这毫无疑问是真实写照，然而对渐变的原因分析得有点牵强。首先，把神宗“倦勤”、“御朝日稀”归之于宠幸郑贵妃，沉迷于儿女情长，就失之偏颇。如前所说，神宗由于宠

<sup>①</sup> 朱国祯《皇明大事记》卷39《神宗》。

<sup>②</sup> 夏允彝《幸存录·门户杂志》（留云居士辑《明季稗史初编》卷14）。谈迁《国榷》卷83，万历四十八年七月丙申。

幸郑贵妃，在册立皇太子事件上一再与廷臣对抗，从而导致“三王并封”之议，以及“妖书案”、“梃击案”之类政治风波。透过这一系列政治事件，人们可以强烈感受到他始终牢牢控制着局面，他的独断专行、固执己见的秉性表现得淋漓尽致。他和廷臣一样，都把这些与“国本”有关的事件，当作朝廷头等大事来对待，丝毫看不出由于宠幸郑贵妃、沉湎于酒色而不理朝政的迹象。夏允彝这位与陈子龙（字人中，号大樽，松江华亭人）齐名的“几社”名士，对于晚明史常有真见卓识，然而关于此事的评述难免陷入“女人祸水”论的窠臼。似乎郑贵妃之与明神宗，犹如杨贵妃之与唐玄宗，其实不然。杨贵妃“女人祸水”论前人早已有所澄清，唐玄宗的荒怠另有原因在，郑贵妃等而下之，则更无论矣。神宗的“倦勤”与“御朝日稀”是应该从别的方面寻找原因的。其次，把神宗后期奏疏“批答日寡”到“绝不视朝”，归结于廷臣的朋党之争使他对奏疏与朝政极度反感的结果，显然是本末倒置了。万历一朝官僚队伍中的朋党之争、门户之见，其实是神宗一手造成的。他在倒冯、倒张的风潮中，为昔日反对新政而遭到黜革的官僚平反，重新起用，委以重任。这些人重新上台后，意气用事，力图把万历十年以前的一切全盘否定。于是形成了两派官僚、两种政见的明显对垒。以后围绕着争国本、争册立、争“三王并封”，以及“妖书案”、“梃击案”，使这种对垒更加具有朋党色彩。如果把这种政治斗争看成神宗“批答日寡”、“绝不视朝”的原因，实在是模糊了君臣之间的责任界限，颇有臣子代君父受过之嫌。由此可见，夏允彝的评述没有抓到点子上。

那么，今人的看法又如何呢？明清史的一代宗师孟森在《明清史讲义》专叙万历一朝史事的第五章，标题赫然是《万历之荒怠》，把神宗亲操政柄的几十年称为“醉梦时期”，说神宗“怠于临朝，勇于敛财，不郊不庙不朝者三十年，与外廷隔绝”，而把原因归结于“专用软熟之人为相”。这“软熟之人”的魁首便是申时行，因为申时行“遇事迁就，以成其过”，章疏留中，讲筵永罢，都是申时行开的先例<sup>①</sup>。香港大学亚洲研究中心的马楚坚把孟森的论点加以发挥，把神宗的荒怠完全委过于申时行。他说：“及申时行继为元辅，其为祸尤大，万历政弊与其有莫大关系……（帝）欲作解放不受束缚，故‘每遇讲期多传免’，时行不但不匡正此变态心理，反助帝偷学，疏其变态为巨流，并为帝虑一偷懒之法，以

<sup>①</sup> 孟森《明清史讲义》上册，中华书局，1981年，第246、260页。

‘进讲章(讲义)’代讲授,‘自后为故事,讲筵遂永罢’……又助上怠政,教其将不愿接受之‘章奏留中’,‘毋下其章’。帝自后所以对奏疏不批不发,置之不理,实‘自此始’。又劝帝拒谏,不辨是非……自是以后,神宗遂以此而自由自在,日耽荒逸,纵情声色,饮酒使气,贪财好货为乐。”<sup>①</sup>

孟、马二氏所论历历有据,并非臆测。然而神宗的怠于临朝要申时行来承担责任,未免太不公平。申时行为人“软熟”,“遇事迁就”,都是于史有证的。不过他是出于张居正“威权震主”的前车之鉴,把威权统统交还给皇上,让他亲操政柄,事事由他独断裁决。申时行的迁就为神宗的独断专行创造了条件,而不是为他的荒怠疏懒提供方便。从事实上讲,在申时行任内阁首辅的几年中,是神宗亲政以来最为繁忙的时期,事无巨细都要过问,根本谈不上荒怠疏懒;从逻辑上讲,申时行如果像严嵩一样专擅朝政,那么神宗才可以像他的祖父世宗那样,不理朝政,荒怠疏懒。

笔者以为,神宗怠于临朝,个中原因固然很多,但最主要的一条是他长期以来耽于酒色,以致疾病缠身,使他对于日理万机感到力不从心。非不为也,是不能也。所谓怠于临朝并非不理朝政的同义语,而且荒怠也有一个随着健康状况逐步恶化而不断加剧的过程。这种状况可以追溯到万历十四年(1586年),这年九月十六日以后神宗连日因病免朝,到三十日病情仍未好转,再次命司礼监传谕内阁,说他原本欲御门临朝,已于卯时(清晨)初刻准备动身,无奈“一时头昏眼黑,力乏不兴”。可见日前暂免朝讲期间“静摄服药”并无效果,仍然“身体虚弱,头晕未止”<sup>②</sup>。礼部主事卢洪春为此特地上疏指出,陛下春秋鼎盛,精神强固,头晕眼黑等症皆非今日所宜有<sup>③</sup>。

确实,神宗头晕眼黑、力乏不兴等病情一传出,臣下无不惊骇,也有人怀疑皇上托疾偷懒。其实是冤枉他了。他的暂免视朝日讲,是因病请假。这毛病拖到第二年,仍不见好转。这年二月初三日,神宗又派文书官传谕内阁:暂免

① 马楚坚《明政由治入乱之关键》,载吴智和主编《明史研究专刊》第5期(1982年),台北大立出版社,第17~62页。

② 钱一本《万历邸钞》万历十四年丙戌卷,九月,杖礼部主事卢洪春于阙庭革为民条。《明神宗实录》卷178,万历十四年九月己未。

③ 《万历邸钞》万历十四年丙戌卷,九月,杖礼部主事卢洪春于阙庭革为民条。《明神宗实录》卷178,万历十四年十月丙寅。

经筵，原因是“连日动火，时作眩晕”<sup>①</sup>。以后，神宗身体时好时坏，视朝日讲经常宣布暂免，但是只要身体状况允许，他还是朝讲如初。例如十五年三月初六日，神宗“圣体初安”，按规定视朝，百官上殿庆贺；随后又在皇极门暖阁召见申时行等三名内阁大臣议论朝政。神宗向三位大臣一见面就打招呼：“朕偶有微疾，不得出朝，先生每忧心。”<sup>②</sup>又如十六年二月初一日，他按例到文华殿参加经筵，经筵完毕还兴致勃勃地与阁臣们讨论《贞观政要》，议论唐太宗与魏徵<sup>③</sup>。不久旧病复发。头晕目眩这种毛病，不能动脑筋，视朝、日讲、批阅奏章当然难以胜任。十八年正月初一日，神宗为了雒于仁的奏疏召见申时行等阁臣。申时行向他提出，皇上有病需要静摄，但也应该一月之中二三次或三四次临朝，处理重大政务。神宗听了并不恼怒，只是解释说：“朕病愈，岂不欲出！即如祖宗庙祀大典也要亲行，圣母生身大恩也要时常定省。只是腰痛脚软，行立不便。”<sup>④</sup>十九年闰三月，神宗在病情稍微好转后，对内阁大臣谈起自己的健康状况时说：“原朕之疾，因火生痰成疾，故食少寝废，尝服药饵，未见瘳愈。以致庙享屡遣代行，朝讲久废。”<sup>⑤</sup>同年九月他又向申时行谈及病情：“朕今年以来，因痰火之疾不时举发，朝政久缺，心神烦乱。”<sup>⑥</sup>真实地流露出他当时久病不愈的心情。其后，王家屏、王锡爵辅政时期，情况仍不见好转，神宗仍是“面目发肿，行步艰难”<sup>⑦</sup>。由于头晕目眩，视朝只能偶尔为之。

神宗在此后的二十多年中，处理朝政的主要方式是透过批阅奏疏、发布谕旨来进行。他始终牢牢地掌握着朝廷的大政方针，这从“万历三大征”的全过程可以看得很清楚。但廷臣们对于皇上深居内宫，无法一睹“龙颜”有所不满。万历二十二年（1594年）七月神宗传谕内阁：“朕自入夏以来，常中暑湿，身体屡生热毒，又头眩软弱，时享（郊庙）暂遣代行。”<sup>⑧</sup>遭到贵州道御史许文造的批评：“顷岁以来，谓郊庙为常事，谓朝讲为虚文。”<sup>⑨</sup>以后类似的批评接连不断。户部

① 《明神宗实录》卷 183，万历十五年二月庚午。

② 同上书卷 184，万历十五年三月癸卯。

③ 同上书卷 195，万历十六年二月乙丑。

④ 申时行《召对录》。朱国祯《皇明大政记》卷 40，国本。

⑤ 《明神宗实录》卷 234，万历十九年闰三月壬申。

⑥ 同上书卷 240，万历十九年己巳。

⑦ 《万历邸钞》万历二十年壬辰卷。

⑧ 同上书万历二十二年甲午卷，七月，庙享代行条。

⑨ 同上书万历二十二年甲午卷，七月，贵州道御史许闻造言条。

主事董汉儒说：“神圣御宇亦且二十三年，何始勤而终怠，国是日非。频年深宫，群臣罕能窥其面。”<sup>①</sup>御史马经纶批评皇上“不郊天有年”，“不享庙有年”，“辍朝不御”，“停讲不举”<sup>②</sup>。

万历二十四年七月十三日，仁圣皇太后陈氏病逝，按照常例，神宗必须参加嫡母的丧礼。神宗又派遣使臣代行其事，理由仍是患病动弹不得<sup>③</sup>。此事遭到廷臣更为严厉的责难，吏部左侍郎孙继皋说：古今大纲常必不可亏，国家大典礼必不可缺，冒恳圣明扶疾护送母后，以光圣人大孝，以慰寰海同情。吏科给事中戴士衡说：母子至情，送终大事，稍知义理者尚思竭僻踊哀送之情，以申无已之忧。奈何以内庭数步之地，顾靳一足之劳<sup>④</sup>。官员们的批评并非没有道理，神宗则有苦难言。他一向以孝顺闻名，待仁圣皇太后恭谨备至，嫡母的丧礼都难以参加，可见确实病重，“动履不便”并非托词。到了三十年二月，神宗的病情突然加剧，二月十六日紧急召见高级官僚，又单独召见内阁首辅沈一贯进入他的寝宫——启祥宫后殿暖阁，当着慈圣皇太后、太子及诸王的面嘱托后事，要沈一贯辅佐太子做个好皇帝<sup>⑤</sup>，足以表明多年身患疾病的神宗身体已经虚弱到极点，否则绝不会有此一场虚惊。自从这场虚惊后，神宗更加怠于临朝了。正如沈一贯在一个奏疏中所说：“皇上居深宫之中，不见群臣，百姓可谓塞耳掩目，置人言于弗理。”<sup>⑥</sup>字里行间流露出不满情绪。这种状况从沈一贯时代到叶向高时代丝毫不见改变。叶向高不无感慨地说：“国家多事，朝政不行，臣沉浮其间，无所转移，实是有罪……然皇上深居日久，如天之穆无声嗅，听万籁之争鸣；如水之漫无堤防，任百川之自溃。典礼当行而不行，章疏当发而不发，人才当用而不用，政务当修而不修，议论当断而不断。”<sup>⑦</sup>叶向高的深刻反省充分揭露了神宗怠于临朝所造成的严重后果。《明史》卷240《叶向高传》说：“当是时，帝在位日久倦勤，朝事多废弛，大寮或空署，士大夫推择迁转之命往往不下，上下乖隔甚，廷臣部党势渐成……”优游林下的申时行在信中与叶向高谈

① 《万历邸钞》万历二十三年乙未卷，五月，附录，户部主事董汉儒上言条。

② 同上书万历二十四年丙申卷，正月，谪御史马经纶外任条。

③ 同上书万历二十四年丙申卷，九月，哭仁圣皇太后条。

④ 同上书万历二十四年丙申卷，九月，吏部左侍郎孙继皋言条，吏科给事中戴士衡言条。

⑤ 《明神宗实录》卷368，万历三十年二月己卯。

⑥ 同上书卷399，万历三十二年八月己卯。

⑦ 同上书卷510，万历四十一年七月丁卯。

及朝政，不胜感慨：“近时事体与往时大相悬绝，阁中开导斡旋止凭揭帖，往时或奉御札或令文书房口答，无中寝者。今答者什之二三，寝者什之七八，此一难也。往时六卿皆备，事体每相商榷，皆得与闻。今疏上报可绝无违驳，遂至不相关涉，此二难也。一时风尚率先，气节少年喜事，口语纷纭，前倡后随，党同伐异，徇之则不可胜从，违之则便相侧目，此三难也。”<sup>①</sup>因此申时行不由惊叹：“方今国事艰危，人情险陂……而众论愈嚣，群情愈涣，少年阴有所拥戴以树私交，而阳有所抵排以淆公是。上下否隔，中外睽携。自古国家未有如此而能久安长治者。”<sup>②</sup>这种状况一直持续到神宗的晚年，而且愈演愈烈。

神宗晚年最后的岁月，是在辽东战事的忧虑与日益加重的疾病煎熬中度过的。万历四十六年(1618年)入夏以来，神宗身体始终不好。六月初六日他对内阁首辅方从哲说：“朕入伏以来，着湿熏蒸，不时腹泻，头目眩晕，身体发软。见今服药未愈，临御不便。”<sup>③</sup>不能御朝，还得为辽事操心，这时他多么需要得力的内阁辅臣为他排忧解难。自从万历四十五年内阁次辅吴道南丁忧归里后，内阁辅臣只有首辅方从哲一人，而方从哲偏偏不是一个勇于任事的股肱之臣，当此多事之际畏缩不前。他因儿子方世鸿杀人遭巡城御史弹劾，索性借此机会乞求皇上罢官。不久，天上出现彗星，京师又有地震，方从哲向神宗上疏说，这些“妖象怪征”是他“奉职无状”的结果，在“痛自修省”的幌子下又想辞官<sup>④</sup>。此举引来在朝官员们的嘲笑、蔑视，他的声望一落千丈。河南道御史熊化上疏弹劾方从哲辅佐无效，甚至私下庇护辽东督抚，使得辽东战事愈来愈糟糕。于是方从哲索性“攒纱帽”，称病在家，坚卧不出。神宗不能没有辅臣，劝慰他不必对言官的弹劾太过于介意：“方今国家多艰，须卿鸿猷匡济，共图化理，岂可以浮言坚欲求去！”<sup>⑤</sup>

万历四十七年春节到了，正月初一日神宗照例又是免朝，这已是近二十年来的惯例了。方从哲还是率文武百官来到午门外举行庆贺典礼，礼毕后，又到仁德门致礼，然后向长期不见的皇上呈进一道奏疏。方从哲在奏疏中对近年朝政缺失——大僚半缺、言路几空——发了一通牢骚。神宗看了之后批示道：

①② 申时行《赐闲堂集》卷38《答叶台山相公》。

③ 《明神宗实录》卷571，万历四十六年六月癸亥。

④ 《明史》卷218《方从哲传》。

⑤ 《明神宗实录》卷577，万历四十六年十二月庚午。



“所请补大僚、用言官，俟朕详览陆续简发……卿为首辅重臣，宜表率百僚，岂可托疾不出，国事何赖！”<sup>①</sup>从去年十二月以来方从哲称病在家，逍遥了四十多天，致使内阁大门白昼紧闭，辅臣揆席虚悬，无人理事<sup>②</sup>。神宗不得不派鸿胪寺堂上官前往方府宣谕：“辅臣方从哲速出视事！”<sup>③</sup>几天后方从哲才声称病痊，出来办公。及至杨镐在辽东大败的消息传来，礼部主事夏嘉遇以为辽事之坏方从哲难辞其咎，吓得方从哲不敢到内阁办公。直到神宗优旨恳留，才放下心来，入阁视事如故。为了减轻压力，方从哲希望皇上到文华殿召开九卿科道等官会议，共图保辽东保京师之策。神宗派文书官到内阁传谕，因疾病缠身，无法出席文华殿会议，希望大臣谅解<sup>④</sup>。以后方从哲又请求从速补充内阁成员，为此连上十几道奏疏，甚至在文华门候旨六天，还是不得要领。过了两天，神宗向方从哲解释，实在是由于病得不轻，无法批阅奏章，不得不拖延，“少俟朕稍愈，即旦夕详览简发”<sup>⑤</sup>。方从哲实在沉不住气了，一反常态，改变以往那种虚与委蛇的态度，批评皇上并无真心实意：“辗转延误，日复一日，是皇上原无允补之意，不过借此以示羁縻耳。”<sup>⑥</sup>矛盾已经尖锐到这种地步，神宗不便再拖，同意由吏部会推六七名候选人供他从中点用<sup>⑦</sup>。过了几天，神宗点用了史继偕等两人，感到不太满意，把简用阁员的公文压住不发。方从哲接到的仍是老一套：“朕昨入夏以来，天气乍寒乍奥，以致腹痛泻痢，服药稍愈。近又连日阴雨，偶尔中暑，头目眩晕，动履艰难。各衙门章奏未经详览，见今服药调摄，俟朕少瘳，次第简发。”<sup>⑧</sup>然而神宗的病始终不见好转，一直到他病逝，仍未正式任命史继偕等两名阁臣。

这时候的朝廷哪里还像朝廷，皇帝疾病缠身，朝政处于半瘫痪状态：内阁只有一人，部院堂上官只有八九人，科道官只有十几人，中央政府难以运转。这种状况引起官僚们的极大不满，内阁首辅方从哲成为众矢之的。方从哲早

① 《明神宗实录》卷 578，万历四十七年正月乙酉。

② 《明史》卷 218《方从哲传》。《明神宗实录》卷 578，万历四十七年正月己酉。

③ 《明神宗实录》卷 579，万历四十七年二月丁巳。

④ 同上书卷 580，万历四十七年三月乙未。

⑤ 同上书卷 581，万历四十七年四月辛巳。

⑥ 同上书卷 582，万历四十七年五月癸巳。

⑦ 同上书卷 582，万历四十七年五月丙申。

⑧ 《明神宗实录》卷 583，万历四十七年六月辛酉。